

抗战时期中共的日军俘虏工作再研究

曲利杰

【摘 要】中共对日军俘虏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前几年,中共对日军的俘虏政策主要围绕不杀俘虏、释放俘虏、优待俘虏等内容展开。1940年后,中共对日军俘虏的政策发生变化,从“返还和释放俘虏”转变为“训练和利用俘虏”的政策。中共所颁布的俘虏政策在削弱和瓦解日军战斗力以及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中共的俘虏政策也存在一些不足。

【关 键 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日军;俘虏政策

【作者简介】曲利杰,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 200093)。

【原文出处】《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22.4.23~36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009)阶段性成果。

俘虏政策是中共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由于工作对象的变化,中共对日军的俘虏政策进入实践之后会出现误差。学界关于中共对日军俘虏政策的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该政策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对其在具体实施中的运作及问题却着墨不多^①。关于中共对日俘虏政策效果显著背后的深层原因等问题也未深入探讨。其二,中文文献利用方面存在不足。目前国内研究使用的主要资料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相关文件、中共主要领导人相关资料、《解放日报》以及中方相关亲历者的回忆录等,还有许多资料未被使用。其三,英文和日文的资料还有待深挖。英文方面,1944年7月,美国专门派出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考察中共的对日俘虏政策。观察组成员约翰·埃默森(John K. Emmerson)等人向国务院提交了有关中共心理战700多页的报告,形成了被称之为《延安报告》(Yenan Report)的一系列文件^②。这些报告详细记载了中共在优待俘虏、教育和训练俘虏、遣返俘虏等政策的实施效果。但关于该报告,尚未引起国内学者们的足够关注^③。日文方面,井上久士的《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和日本人反

战运动》一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的俘虏政策”和“野坂参三到延安新俘虏政策的展开”,但并没有就具体内容和细节进行分析^④。藤原彰和姬田光义的《日中战争下日本人在中国的反战活动》收录了原日军战俘香河正男、古贺初美、山本一三等的采访和相关人员的回忆调查^⑤。中共对日俘虏政策取得的效果如何,在日方档案资料、日军战俘的回忆录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但现有成果却没有利用。

基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美军《延安报告》和日军战俘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尝试对中共的日军俘虏工作进行深入研究。

一、抗战时期中共的日军俘虏政策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对日军俘虏政策及其重要性进行了相关阐释。中共中央、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指示,规定了日军俘虏政策的基本内容。1940年以前,中共对日军俘虏主要采取的是释放和返还俘虏的政策,这有利于日军了解中共的俘虏政策,揭穿日军诬蔑中共残杀俘虏的谎言。1940年后,中共开始注重对日军俘虏的训练和再教育,使其成为反战的重要力量。关于中共对日军俘虏的政策,其主要

内容如下:

第一,不杀和禁止虐待俘虏。中共自抗战初期就确立了不杀日军俘虏的方针政策。1937年9月25日颁布的《告日本士兵书》明确规定:“中国军队绝对不虐待日本士兵,决不乱杀你们”“只要你们允许解除武装,我们决不乱杀一个”^⑥。同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宣言》也指出,“中国军队哪怕只有一个日本士兵也不杀。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装,立即优待。”^⑦之后历次颁布的有关俘虏政策都强调了“不杀俘虏”。例如在同年10月25日正式颁布的《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中,第一条即明确规定:“对于被我军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⑧。在不杀俘虏这一政策基础上,中共还规定了禁止虐待俘虏的政策。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采访中强调:俘虏要解除武器,但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加以侮辱和虐待^⑨。1938年,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也指出:“应当极力禁止虐待俘虏,经过优待、教育、解释后,立即把他们放回去”^⑩。1940年7月7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在对日俘政策的命令中,再次重申“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动来者,绝对不准伤害或侮辱”^⑪。可以说,不杀和禁止虐待俘虏是实施俘虏政策的根本前提。

第二,释放和遣返俘虏。193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颁布的《关于对俘虏处理办法的指示》中指出:“敌军宁打死不缴枪,我若于俘获后再杀,必更增其恐惧,为着瓦解敌人,以后凡俘之敌军,如无法弄回时,应将其武装解除,发钱三元放回”^⑫。由于日本军部不承认俘虏的存在,八路军释放回去的日本俘虏,多被日本军部杀害。为避免俘虏遭到迫害,八路军政治部发出指示:“关于释放俘虏,鉴于有些放回去则被处死者,释放时要送给比较开明之敌军官佐警备的据点内,不要送到更加法西斯化的敌官手上”^⑬。关于俘虏释放期限,据日军俘虏说,在作战后失去联络、若归队时间超过一周就会被枪毙,因此中共不得不调整相关政策。1938年10月22日,总政治部在给毛泽东的致电中指出,今后被中方俘虏的日本士兵,除特种人员应积极劝留我方外,其余俘虏三天之内必须将其欢送释放,并特别强调:“此项政策不许用书面书写,只准口头通知

到团为止,以便保守秘密”^⑭。之后因三日释放俘虏的期限过短,1939年2月18日,中共颁布《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将释放俘虏的期限延长为两周以内^⑮。中共有关释放和返还俘虏的政策就此确立下来。

释放俘虏的政策揭穿了日军捏造八路军虐待和杀害日军俘虏的谎言。据日本工农学校校长赵安博回忆,抗战初期,日军士兵被告知“共产军虐待并杀害俘虏”,“为揭穿敌军谣言,扩大我军的影响,从而根据日军俘虏的意愿,采取释放俘虏的政策”^⑯。1939年3月《八路军军政杂志》首次刊登了有关遣返俘虏的新闻:“我方逮捕了若本(26岁,农民出身)和笠原(工人出身)两名日军俘虏,通过讯问获取敌情情报、教育后加以释放”^⑰。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指出,“如果将受到优待、打动人心的优待和感动的日本兵俘虏大量送入敌军内部,将成为对日本军的宣传工作”;他还强调“就如同我们给敌军派遣了很好的宣传队一样”^⑱。释放和遣返俘虏的政策,最终被定位为中共对日宣传工作的一部分。

第三,优待俘虏。为了更好瓦解日军的战斗意志,1937年10月6日,总政治部还颁布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对敌之俘虏应加优待,伤兵应给医治,在火线坚决拒绝之敌人自应杀伤,但被缴枪不杀俘虏者,即应多方弄回,加以政治宣传后,再行处置,不应因其拒绝而再行加害”^⑲。同年10月25日颁布的《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制定了优待俘虏政策的具体内容:第一,对于被我军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第二,对于自发前来的人,必须保障其生命安全;第三,对在战场上受伤的人,应依阶级友爱进行治疗;第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⑳。

1940年7月7日,中共又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颁布了《对日俘的政策》,该命令不仅对之前有关优待俘虏政策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和完善,还明确规定:“对战死或病死之日本士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等”^㉑。1941年9月15日,总政治部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规定》中,将优待政策进一步细分为“一般优待”“特别优待”和“俘虏

教育费用”。“一般优待”即每月津贴五元,伙食费是八路军的两倍,节假日除了部队领导请客俘虏外,在粮食、服装、日用品等方面也有优待;在行动中俘虏还可骑乘马匹并驮载行李;对于健康上有特殊情形者(如因病伤及身体衰弱)还酌予保养费。“特别优待”规定对新来的俘虏、军职较高的俘虏、预定遣返的俘虏特别优待,规定了其他旅费、优待费等特别优待政策;“战俘教育费用”规定了文具、书籍的购买费用、反战团体的经费等44项^②。

第四,教育俘虏。中共在采取释放和遣返俘虏政策的同时,规定“如果状况允许的话,敌人的俘虏一般长期滞留,对其进行深刻教育”^③。早在1938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就在前线通过个别谈话和劝导等方式对日本战俘进行了思想改造。短期教育的时间大约在一周以内,教材主要是利用面向日本士兵的小册子、传单等宣传资料。在情况许可下,一般会将战俘多留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教育。中共在对他们进行短期教育的过程中,可以评估他们的状况选择谁可以释放、谁可以继续接受中期课程,在决定谁接受中期课程后再转移到后方^④。对俘虏短期教育后,中共开始对留下来的日军战俘进行中期教育,时间为6个月。但是留下来的日本战俘大多分散在八路军的前线各部队中,缺乏相对稳定的改造环境。经过再教育的日本战俘虽开始从事一定的对敌工作,但由于他们缺乏政治工作的背景和训练,一般都需要加以严密的监督。

1940年7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明确指示:对日军战俘的训练工作“应有长期的、适当的教育计划”^⑤。同年10月,在日本共产党野坂参三的建议下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开始对俘虏进行系统长期的教育。学校宗旨为:第一,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第二,团结日本人民反对战争;第三,壮大反战的力量和技巧;第四,帮助日本人民做好准备,以期参与日本的战后重建^⑥。学校根据俘虏的社会出身、教育水平、思想状况等编入了不同的班级,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措施和方法。后来随着学员增多,该校又筹办了晋西北分校、山东分校和华中分校。到1945年8月,学校共培养了350多名日军俘虏,其中100多名毕业后被分配到抗日根据地前线工作,成为中共

敌军工作的得力助手^⑦。

第五,训练和利用俘虏。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前几年,中共对日军的战俘政策主要围绕不杀俘虏、释放俘虏、优待俘虏等内容展开。1940年后,中共在延安发布了一项新的对日俘虏政策,命令其军队使用日本战俘进行宣传。毛泽东在1940年发布的《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过去对俘虏工作之困难,原因为没有日本人赞助我们,假若我们能训练出几个同情我们的俘虏,对今后俘虏工作及一般敌军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⑧。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0年4月6日颁布的《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予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予较长期的训练。现决定晋东南选3名、晋察冀军区送3名、一二〇师送3名最进步的日本俘虏来延安受训,以培养出日本的革命者。并规定了各部队敌工部的工作经验指定专人到延安汇报^⑨。

1940年7月,中共发布了《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命令其正式使用俘虏。该指示规定“各师、各纵队、各军区、各战略单位要力求训练十几个进步俘虏帮助我们作敌军工作,这是很重要的”,还指出,“对新俘虏之工作,可利用旧俘虏去进行;凡自动过来的,查明真相后,一律不应强迫送回,而应争取帮助我们做敌军工作”。并制定了训练俘虏的方法,例如“参加传单起草、教授干部训练日语、参加文运工作、参加俘虏之训练、自愿的写信回国给其亲友等”^⑩。该指令明确了对俘虏不遣返而采取积极利用的政策,这也是对俘虏进行教育后参加反战活动的具体规定。根据1941年6月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士兵小林宽澄的回忆:“在被俘后的2个月里八路军要求我去加入日人反战组织,但是我对这些工作完全没有兴趣。所以每天多次到八路军干部那里,恳求早点回日本。但是每次都被告知说‘近期就回去,请稍等’,这件事最后不得不放弃”^⑪。

综上所述,1940年后,随着敌军工作的开展,中共对日军的俘虏政策已发生了变化,开始注重俘虏的训练和利用。在此期间,敌工部的态势得到了强化,总政治部明确指示将日军俘虏用于敌军工作。需要强调的是,优待俘虏政策、释放和遣返俘虏政策

以及教育俘虏等政策之间密切相关,并没有明确的时间间隔点。例如1940年延安工农学校成立后,在重视俘虏教育政策的同时,释放俘虏的政策没有被中止。但是随着新方针的制定,对敌军工作的完善,释放和遣返俘虏的数量减少了,这是因为“原期望的被释放的日军俘虏成为日本革命家并参与反日活动”效果是不明显的^⑧。相反,参加反战运动的俘虏逐渐增加了。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释放俘虏”政策是主流,但俘虏优待和俘虏教育等政策也在同时进行。1944年,随着日军俘虏的增加以及中共反战工作的需要,中共颁布了停止释放俘虏的政策。同年6月,总政治部在《关于敌军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为培养更多日本革命力量,确定今后原则上不释放日本俘虏”^⑨。

二、抗战时期中共日军俘虏政策的实施效果及成因

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抗战时期日军士兵在战场上被抓获后大都会选择自杀、抵抗或者逃跑,成为俘虏的很少。据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回忆,“抗战初期,我军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取得了许多胜利,但日军俘虏极少。在1937年9月的平型关之战中,歼灭日军3000余名,一名俘虏也没能确保”^⑩。然而,随着中共对日俘虏政策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日军士兵投降、被俘。“现在,向八路军投降的日军俘虏们百分之三十都是自发投降的人”^⑪。在美军对延安日俘的采访中,战俘们无一例外地承认,“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士兵中已经广为人知”^⑫。日本士兵普遍了解到:“他们向八路军投降或被俘虏,是会被虐待的。大多数被包围的日军将不再进行最后的顽强抵抗”^⑬。到抗战末期,除因在战斗中被捕外,自发加入八路军的日本士兵逐渐增多。如果仅仅以敌军投降人数而论,全面抗战八年里,中共俘获日军官兵共计7118人(八路军俘获5096人、新四军为2022人),其中投诚者746人^⑭。

根据中共的政策大部分日军士兵被释放回去;对自愿留下来的日俘,则对他们进行一定的思想改造。事实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师和学员,“除校长野坂参三之外,都是前战俘”^⑮。根据美军在

1945年1月的数据统计,“该校40%的学员是逃兵、散兵或自动投诚者,其余的则是在战斗中被俘的”^⑯。这些日军士兵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思想教育,“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拥有中学以上学历的不到5%”^⑰。然而,“在延安以及共产党统治地区的地方,有一半以上的战俘再教育是可以肯定的”^⑱。1944年11月15日,美军对该校98名日军战俘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显示90%以上的日军士兵反对战争和天皇制^⑲。可以说,中共的教育政策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战俘所持有的封建的天皇制意识形态。被改造的学员中,甚至出现了在听到“为天皇而死”“安置在靖国神社”等词语而发出冷笑的现象^⑳。很明显,他们已经失去了日本军队教育中带刃的“大和魂”。一名战俘当着所有人的面无所畏惧地表示,自己期待着日本早日战败,那样的话就可以回到祖国,在和平的“新”国家开始工作^㉑。

在中共俘虏政策的影响下,日军士兵不仅改变了其思想,而且还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日人反战运动。早在1939年,经中共改造过的日军战俘就在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中共的大力支持下,该同盟迅速扩大。从1939到1942年,先后成立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晋东南等6个支部。1940年7月7日,在野坂参三的建议下,日军战俘又成立了“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1941至1942年,陆续成立了华北、苏北、晋察冀、冀中、滨海五个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盟员人数从1939年的若干人增加到1942年的百余人。1944年,野坂参三将以上反战组织进行合并,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该组织以“建设民主日本、成立人民政府”^㉒为目标,工作对象也从日军士兵扩大到在华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国内人民。到1944年底,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中国华北和华中建立的17个支部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前线的对敌宣传工作中,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成员已经取代了最初训练他们的八路军敌工人员,中共已将有关战俘的一切工作都交予该组织”^㉓。该年,他们共出版了14种小册子和32种传单。战俘们还通过无线电和电话直接跟日本士兵联系,并写信给他们,或通过慰问袋等方式进行反战活动^㉔。他们拼命出现在最前线,直接号召现在已是敌

军的日本士兵。根据延安提供给美军的数据,“到1944年12月,约400多名日俘在延安和中国共产党其他的根据地前线进行反战宣传”(参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到,1944年12月,被中共俘获的日军士兵中有70%的加入到对日军的反战工作中去。到抗战结束时,参加日人反战组织的日本士兵俘虏规模扩大到上千人。他们^⑧通过写传单、标语、喊话等形式开展对日军的宣传瓦解工作,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不少人为进入日军的前线实行引起骚动与叛变的宣传而牺牲了性命”^⑨。

美军在《延安报告》中总结道:在延安的大部分日本战俘经过改造后,他们从心底深处确信自己是反战、反军国主义的,并希望在战后重建的日本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接受的教育多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中国共产党没有对他们施加特别的压力,要求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目前,延安学校约有(27名)的学生属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毫无疑问,“八路军对日军的俘虏政策很成功”^⑩。

关于中共对日俘虏政策效果显著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所有俘虏一样,日军战俘也处于极度困惑和失望的境地。更重要的是,由于日军不承认俘虏的存在,日本战俘成了没有国家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成为“已经死去的人”。反过来,在被中共俘虏后,战俘们“了解到八路军不杀害俘虏”“俘虏们对落到八路军手里还受到良好待遇感到震撼”,他们

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⑪。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发现八路军中有日本人,“先是对终于能讲日语以及有人能听懂自己的话感到欣慰,然后瞬间觉得,如果日本人也加入敌人的行列,那敌人不会一无是处”^⑫。俘虏们在从前线向延安移动所需六周以上时间里,通过与八路军的接触,“发现八路军对农民以诚相待,所到之处都深受农民欢迎”,“战俘们在逐步了解八路军的战斗史后,也逐渐接受了他们的信仰”^⑬。在现场没有日语翻译的情况下,日本俘虏还会得到一本用日语介绍八路军政策的小册子。小册子中有一个简短说明:中日两国人民无正当理由开战,这场战争的责任在于日本军部和资本家,强调他们将有机会工作和学习,为战后建设和平民主的日本做准备^⑭。

在物质上,中共对日军战俘的衣、食、住等方面都优先照顾。日军俘虏像华北农民那样,住在窑洞里,睡在板床上,但是他们的配给要高于八路军的普通士兵^⑮。据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所说:“俘虏是一律优待的,那怕我们吃黑豆,也要尽可能的给他们找大米、白面、鸡蛋或猪肉”^⑯。日军战俘香川孝志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促使我们感情和思想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接触的八路军士兵非常亲切和诚恳的态度……即使他们自己吃粗粮,也要为我们准备可口的饭菜。这些行为怎能不感化我们呢?”^⑰

表 1 1944年12月中共根据地俘虏的日军人数和参加反战人数的对比

各根据地名称	俘虏的日军人数	参加反战的日军人数
晋绥支部	24	17
太行	39	25
太岳	25	22
晋察冀	28	20
冀鲁豫	30	26
山东	153	70
延安	125	111
华北总数	424	291
新四军	162	137
东江纵队	23	
总数	1033	719

资料来源:Yenan Report 59: "Statistics on Japanese POWs taken by the 8th Route Army", collected by 8RA and JPTEL, transmitted by Adie Suehsdorf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再则,从政治和集体生活上,给他们以充分的民主自由。通常,成为俘虏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光彩的事情,但八路军对那些转变思想的日本俘虏,一律以“国际友人”对待,并给予其与根据地军民同等的公民政治权利。例如1941年11月,根据陕甘宁边区“三三制”原则,作为特例吸收日本学员森健为边区参议员。同时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中小路静男也被选为延安参议会议员^⑤。他们不仅直接参与边区民主政府的工作,而且有权对边区各级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和弹劾。

生活上、政治上的优待,消除了日军士兵对八路军的敌对情绪,从而为他们在思想上的转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许多日军士兵来自社会底层,接受八路军用马克思主义向他们解释劳工阶级为什么会受苦受难而慢慢产生了共情。进入延安工农学校后,“学员们将置身于舒适友好的日本人氛围中。他们发现学校管理也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授课也都是用日语进行的。除了野坂参三校长和另一位干部以外,他们都是像自己一样的战俘。他们的反应马上变得积极起来,并为随后的思想教育敞开了心扉”^⑥。起初,教育是非正式的。学生们成立讨论小组,开始着手学习野坂参三写的《呼吁日本国民》小册子。许多受教育程度有限的战俘发现,他们可以加深对日语的了解,同时还能遇到新的、引人入胜的思想和想法。由此产生了成就感,大多数战俘都在努力学习^⑦。

授课教师会一直在场解释教科书的内容并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虽然参加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在了解了联盟的原则和计划后,战俘加入了“A”班,并参加了关于“政治常识”和时局的课程^⑧。学校还会举行简单政治经济学内容的一系列讲座。教师们发现,“班里学员生活在一起,通常以同志意识、对话和小组学习的形式进行再教育相对容易。”^⑨这个课程通常持续3个月,之后学员进入“B”班,学习包括日本历史在内的各种问题,学生还会接受中文教育^⑩。学员课程结束后,能力特别高的人,被选拔去前线从事有关八路军的宣传工作,当然这是根据本人的意愿自愿参加的。

通过阅读和学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知识,他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这是一场日本军国主义

者和财阀的战争,只有他们才能获利,而其他人只能变得越来越穷。一位当过工人的战俘说,他曾经认为工人阶级的苦难是由于在日本不可避免而遭受的结果。现在他明白工人阶级被出卖了,他和他所在的阶级应该在新政府的领导下过上美好的生活^⑪。一些学员还学习了毛泽东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分析是精辟的,他的一些预见已经得到证实。因此他们丧失了对日本获胜的信心,对中国最终取得胜利充满信心^⑫。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延安的日军俘虏并没有被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日本军阀在战争的重担下解脱^⑬。

在平时的学习管理上,中共会给这些俘虏相对的自由空间,他们可以随时两三人一组自由上街,没有警备人员陪同。但学校会严格遵守“士官与军官战俘分开和单独盘问”的原则,“尤其是当战俘被发现缺乏耐心、是狂热爱国主义者或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时,将不允许该战俘与其他战俘接触,以防影响其他战俘”^⑭。这些战俘会被送到专门的临时收容所即工农二部^⑮,当他们的态度好转后,就被转移到日本工农学校^⑯。

中共认为这样对待和训练战俘,不仅可以说服日本战俘对其同胞进行实地宣传,亦可使他们在战后的日本本土担任政治领导者^⑰。在华北和华中正在开展的敌军工作中,日军战俘的对敌宣传活动尤为有效:“日军战俘所在的宣传队不仅知道驻扎在作战地区日军士兵的姓名和军衔,还知道很多个人资料”,“日军俘虏们有时会伪装成中国农民的样子进入日本军事阵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⑱。“一名日本士兵虽然是日本军的一员,但他提出想加入解放联盟。他提供了有关他所在部队的军事信息,并就即将发生的袭击发出警告。事实证明,他的情报是准确的”^⑲。“日本军官对八路军的宣传变得很警惕。他们向自己的部队发出了警告,并命令他们不要被宣传所打动。此外,还派了几名特务到八路军阵地收集情报。但是,一般情况下,间谍很快就会暴露原形,让他们接受一定的思想教育课程。据说其中很多人不久就会坦白自己的任务”^⑳。

中共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改名为日本人民解放

联盟,致力于盟军的宣传战略。1944年1月日本工农学校和八路军共同决定对改造后的日本人进行现役军事培训。野坂参三认为战争将至少持续一年半,他目前的计划是从现在开始对学员进行大约一年的大规模培训,“日本学员将与八路军部队共同作战,如果可能的话,参与美军在日本本土的登陆行动”。截至1945年1月,学校共有134名学员到该年年底即可与盟国占领军合作从事宣传工作。“当战争逼近日本,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之际,这些工作变得十分必要”^⑤。由于苏联参战以及美军投下原子弹,使得参与登陆作战等计划不了了之。实际上,基于这种想法,活跃于战后的日人解放联盟的学员,以满洲为中心拯救了许多日本人的生命。并且包括他们在内的被中共救出或者留用的许多日本人,在解放战争中加入了人民解放军,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⑥。

三、中共对日军俘虏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应对

中共的俘虏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会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抗战初期,由于中共的俘虏方针并没有传达到中国士兵和农民之间,出现了不少不当对待俘虏的案例。据《敌我在宣传战线上》记载:“冀中八路军在与日军作战中,俘虏了包括连长在内的日本兵。八路军带着俘虏在后方经过一个部落时,村里的农民用农具为武器包围了日本俘虏和八路军的护送兵。农民要求立即枪毙日本兵。否则就要解除八路军护送兵的武装,反复说服无效后,农民们用锄头杀死了这十几个日本兵俘虏”^⑦。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也曾讲道:“我们在战场上杀害敌军战俘的事情非常普遍,即使当时不杀,也有后来对其侮辱、虐待的情况。这种错误的行为绝不能继续!”^⑧显然,不当对待日军战俘的现象与中共优待俘虏的政策相违背,这也成为日军死不缴枪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敌工部副部长张香山曾说道:“我们的滥杀日军因我们军队对俘虏政治工作的认识不足,对可以俘虏之敌军亦加杀戮,此种事实造成日军之恐怖心理,遂不敢缴枪”^⑨。

实际上,要让中国士兵和农民接受这一政策并不容易。由于日本人是残忍的侵略者并在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年轻人参加八路军往往就是为了

报仇,所以大部分日本人俘虏都被杀害了”^⑩。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向各部队三令五申,明确要求将不杀和优待俘虏作为必须严格执行的军中纪律^⑪。违反这一命令的士兵将受到以公开批评和全面再教育方式进行的“惩戒”。例如一二九师三四三旅的一个排长因枪毙投降的日本兵,不仅受到了行政处分,并在部队中展开了斗争,以教育全体战士^⑫。另一方面,中共开展了面向士兵和民众的教育说服工作:其一,向中国士兵发放关于处置俘虏的小册子,里面印制了有关“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内容;其二,按照每排1人或每连3人的比例,挑选有出任组长能力的士兵进行3至6周的俘虏政策教育。完成学习后,这些士兵将返回自己的部队,去给其他士兵传授自己所学的内容^⑬。即使如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会出现问题。1943年4月,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就因殴打日本俘虏被中共辞去副校长职务^⑭。这一举动既证明中共对俘虏问题的重视,也说明了政策下达与具体执行难免会有冲突。

其次,关于释放和遣返俘虏,存在着有的日军士兵宁可以负伤等理由在根据地长期滞留而不愿意回国的现象。抗战初期中共采取了释放俘虏的方针,但是由于日本军部不承认俘虏的存在,被遣返的日本战俘都受到了严厉处罚。据日方资料显示,1939年10月中旬,从河北省八路军第三纵队本部遣返的8名俘虏于11月上旬向天津宪兵队自首后被逮捕。8名被遣返的俘虏受到了怎样的处分并不清楚,但在1940年1月的日本陆军省局长会报中,法务局长报告显示,至今为止共有26名士兵被遣送回国,其中2名因泄漏军事机密被起诉、18名不起诉、6名正在调查中^⑮。这样的处置虽然看起来宽大,但是也有报告说,在1941年11月,从法务局长到投降士兵都被判处了死刑。而且八路军遣返俘虏的数量逐渐增加,1941年有70名,1942年达到了99名^⑯。据推测,这一数字仅限于华北。99名中有18名是自愿被遣返,5名是被夺回的,其他人是接受反战教育后,作为宣传或间谍被送还回国的^⑰。虽然也存在没有向上级司令部报告的事例,但是被遣返俘虏们的处置因部队和时期而异。多数俘虏在日本军法会议上降级后被

送进了军事监狱,有的会被枪毙,有的被强迫自杀。日军在收回俘虏的时候,也有使用假计,将俘虏们共同杀害的事例^⑧。不管怎么说,原来的军队很难顺利地接受遣返的俘虏。关于中共遣返俘虏的数量,据统计,自抗战初期到1944年11月止,中共所俘虏的2407名日军士兵中,除自愿留在延安的322人外,其余的全部被放回原队,或秘密回到沦陷区^⑨。

最初,中共期待这些被遣返的日军俘虏回到原部队后,能形成反军国主义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八路军会对被释放的俘虏进行短期教育,教育的时间长则半年,短的不过是一个多月。例如就有像冀中根据地吕正操的八路军第三纵队的日军俘虏那样声称要“潜入国内参加革命活动”而释放者存在^⑩。“但是这样的作法是权宜之计,效果有多大是存疑的”^⑪。中共当时的政策是,要求他们停留2周,在此期间好好优待他们,同时教育他们是可以被收留的。如果这样,他们还是想回到日本军队中的话,就会给他们举办送别会。敌军工作部负责人蔡前提到:“照国际规例,俘虏是在战争结束后交换释放。但是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欺骗,可以在俘虏中选择其比较觉悟者送回。当送出的时候,动员民众开欢送会,给予深刻的印象”^⑫。在有关是否担心释放的俘虏们会将根据地的军事情报泄露给日本军部,八路军解释说,因为日军战俘无法接近重要的军事部门;而且日军军官们已经丧失了对他们的信任,不会重视他们的情报^⑬。

俘虏们在伺机逃回日本军队失败后,也获得了不少经验。例如,日本士兵石田美喜在百团大战中成为俘虏后不愿归顺,回到原部队后不仅被中队长和宪兵殴打,威胁其“为什么没有自杀”“你回来想执行什么任务”等,还被送往在保定的军事法庭。之后石田乘机逃走,又回到了八路军那里^⑭。随着日军对俘虏方针特别是对中共遣返回去俘虏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日军士兵希望留在八路军中的人数以及投降者数量也逐渐增加。据数据显示,1940年日军俘虏中希望留下来的人仅占7%,而在1943年达到了48%^⑮。日军中按照自己的意志投降的人也比以前增加了,坚持战斗到最后的士兵变少了,日本军队的战斗精神正在下降^⑯。1944年,随着日军俘虏的增加

以及中共反战工作的需要,中共颁布了停止释放俘虏的政策。1944年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在对野坂参三的采访中,野坂也提到:“现在几乎所有的俘虏都不遣送回去了,而去学校学习”^⑰。

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不希望回到原日军部队也不希望留在八路军内的日军俘虏被移交给了国民党。位于西安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内有几十名日军俘虏。1938年5月,在太原捕获的满铁工作人员森健(本名吉积清)是最初被送到延安的俘虏之一,其中6名俘虏中有4名因不适应八路军的气氛,希望转移到西安^⑱。据不完全统计,从延安返还西安的军政部第一收容所的俘虏为42名,1939年为14名,1940年2名,1941年3名,1943年23名^⑲。

最后,关于日军战俘的思想弱点以及在工作态度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延安的战俘大部分都是原日军部队的下级官兵,其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观念依然残留在他们头脑中。因此对日军战俘的思想改造并不容易,“通常学员的思想转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有些棘手的情况下甚至花费了一年或更长的时间”^⑳。学员们对所学的课程也不感兴趣,他们不仅讨厌上课,而且违反校规还赌博;有些人早上不起床,或通过拒绝洗澡来进行消极抵抗;一些人想回家并试图逃跑,甚至有学员曾在明治节爬上延安宝塔山顶,高呼天皇万岁^㉑。有些学员虽被改造过来,但民主意识不强,欺负新学员。1942年8月中共制定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就明确指出日军战俘存在“任意妄为的自由主义”“不喜欢别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蔑视落后于政治的东西,不帮助他人只想自己变得伟大的虚荣心”等问题^㉒。

为帮助他们摆脱旧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在1942年6月至1945年8月的3年间,中共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加强战俘的思想改造。像整风运动那样,要求他们对思想和行动进行自我检查,或进行集体批评,“这在共产党的队伍中经常进行的,现在工农学校也沿袭了这种做法,经常召开集体批判集会”。野坂参三认为工农学校的批评对于日本学员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批评有助于学员们摆脱

陈旧、禁锢的思想,从而理解和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使俘虏们摆脱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有利于学员们互相理解和合作,不再抱有疑虑和猜疑”^⑧。从入学开始,学员们就渐渐养成接受建设性批评的习惯。虽然对新生的批评很温和,但是随着对他们再教育课程的推进,自我检查和集体批评会变得更加尖锐和严厉化^⑨。反战同盟苏北支部长古贺初美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42年,因在其带领指挥的一次战斗中出现了两位负伤者,作为新四军副大队长的古贺接受了一周左右的调查和批评,并被要求进行阶级划分和自我坦白。虽然古贺的出身最后被定位为劳动阶级,但据其说这是一项伴随着严厉批评的整风运动^⑩。之后,因为古贺表现良好,还被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

尽管如此,这些日军战俘的思想弱点并没有得到根本克服。日本战败后不久,石堂清伦在大连从事日本人归还工作。他这样描述和解放军一同来到大连的日本“外来干部们”也就是延安的反战士兵们:“他们不理解士民的情感,用的是军队的命令主义作风。虽然遵守军纪律这一点很厉害,但是,不可能用命令和指挥来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好像忘了要融入市民生活当中,他们受到中共的庇护,宿舍也和一般日本人相互隔离,他们仿佛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上,来监视一般日本人”^⑪。石堂还指出,虽然是偶然到大连来的一部分反战士兵,但是他们似乎孕育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他们对于迎来日本战败后自己的主张和行动是正确的这一点抱有过信的优越感。即使有人采取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态度也不足为奇。原日人反战士兵前田光繁也对战败后在旧“满洲”地区活动的伙伴们作了如下回忆:“这些反战士兵(摇身一变)被提拔为干部、身处与往日不同的环境之中,周围有着触手可及的诱惑,虽然大部分人端端正正为人处世,坚持过简朴的生活。但可惜的是,一部分同志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⑫。古川万太郎在其书中更是直接指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的品质有问题^⑬。

余论

中共对日军的俘虏政策作为瓦解敌军工作的一环,在军事目的上、尊重人格与生命、对战争本质的

觉醒等理论价值层面上都是一致的,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评价,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少有的。中共的俘虏政策采取的基本态度与精神也与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相吻合。这种理念,与其说是共产主义思想,不如说正是由于中共的优待俘虏政策和人道主义精神,才为日军士兵们变成反战战士提供了契机。当然,这些经验并非共产党独有。早在1939年,国统区的鹿地亘就在桂林对俘虏进行了2个月的教育和培训。1939年12月26日,鹿地亘带着12名战俘奔赴前线。他们使用扩音器和电话进行宣传、把写好的传单散发给日军士兵。之后鹿地亘还组建了日人反战同盟重庆总部,并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断断续续地开展了此项工作。

中共优待俘虏政策的案例为美国执行类似任务的宣传机构提供了参照。在德里,盟军选拔了六七名日本战俘来协助为自己的国家和美国战时情报局进行制作宣传单的工作。这些战俘虽然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思想教化,但仍坚定信念进行了反战宣传。在协助美国政府机构宣传活动的战俘案例中,战区法律部部长表示,在严格遵守某些限制条件下进行此类活动并不违反日内瓦协议,这一点是应附记的^⑭。当然,中共和延安的情况与美军拘留日本战俘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军方面不具备中共将战俘成功优待的特定有利条件。这个条件包括战争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在优待俘虏这一政策下,很多日军俘虏确实会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是接受思想教化的。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在世界其他地方成功实施该计划似乎并非不可能。实际上,随着战争愈来愈接近尾声,美军精心挑选了一批日军俘虏和日本人,在美国的亨茨维尔对他们进行了再教育。接受再教育的这群日本人不仅进行了反战宣传,而且在美国执行战后对日占领与和平建设等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⑮。

注释:

①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任伟:《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与实践》,《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闫树森:《抗日战

争时期对日本战俘的改造与中国共产党的入权保障政策》，《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何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俘的改造政策及其影响》，《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②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国当局分别派出观察组到延安进行访问，成员包括美军上校包瑞德、中缅印战区政治顾问谢伟思等18人。随后美军对延安的情况做了详尽的报道并加以效仿，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延安报告”的一系列文件。这71份美军观察组报告可以在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许多地方找到，是美国官员与中共及日本工农学校在敌军工作上进行广泛合作的遗产和证据，它表明美国曾得到中共明确的帮助，并在打败日本的战略中采用了中共的一些方法。从1944年10月至1945年5月，美军观察组成员提交了有关日本工农学校700多页的报告，全部以“延安报告”为名，编号为1至71。《延安报告》的日文版档案汇编见山本武利『延安リポート—アメリカ戦時情報局の対日軍事工作』、岩波書店2006年；山極晃的『米戦時情報局の延安報告と日本人民解放連盟』也对延安报告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分析。

③基于该报告出现的研究成果有吕彤邻：《美军观察组延安报告中的日本工农学校》，《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诸葛蔚东等人：《延安时期中共对日宣传策略研究——基于美军观察组〈延安报告〉》，《党的文献》2020年第4期；曲利杰、邓军《抗战时期美军对中共对日心理战的考察与借鉴》，《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4期；曲利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战俘的思想改造》，《党的文献》2021年第3期等论文也使用了这些美军资料。

④井上久士『中国共産党の捕虜政策と日本人反戦運動』、『近きに在りて』、1998年11月。

⑤藤原彰、姫田光义『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東京：青木書店、1999年。

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357页。

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43页。

⑧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79页。

⑨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⑪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⑫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⑬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627页。

⑭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243页。

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6页。

⑯赵安博『延安日本労働学校』、『アジア経済旬刊』、1983年1月1日、15頁。

⑰《捉放俘虏记》，《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期，1939年3月15日，122页。

⑱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国文化社1939年版，第321页。

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61页。

⑳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82页。

㉑主要内容是：1、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动来者，不准伤害、侮辱；其所携物品，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并须以弟兄待遇彼等，我军如有指战员违犯此项命令者处罚之。2、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予治疗。3、愿回国或归队之日本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4、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以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5、愿与家族或友人之士兵，应尽可能的予以方便。6、对战死或病死之日本士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47～648页。

㉒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696～697页。

㉓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第183页。

㉔山極晃『米戦時情報局の「延安報告」と日本人民解放連盟』、東京：大月書店、2005年、53頁。

㉕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530页。

㉖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㉗总政治部联络部：《八路军敌军工作史》（上），总政治部联络部1998年，第55～56页。据日本方面研究：到1945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数大约有270名。学生人数到战争末期激增，据推算总计约350人。1943年以后，晋西北和山东等地设立了分校，加上这些话，恐怕超过500人，见井上久士的论文『中国共産党の捕虜政策と日本人反戦運動』；中国方面显示有500多名，据资料显示：从1940年到1945年之间，500人左右的日本军俘虏在这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一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反战联盟。见肖冬：《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创办的日本工农学校》，《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第58页。

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530页。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59页。也有资料显示该指令直接由野坂本人起草的。见井上久士「中国共産党の捕虜政策と日本人反戦運動」、「近きに在りて」、1998年11月、6頁。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530页。

④藤原彰、姬田光义『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第149頁。

⑤山本武利『延安リポーターアメリカ戦時情報局の対日軍事工作』,岩波書店、2006年、478頁。

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页

⑦赵安博「延安日本劳農学校」『アジア経済旬刊(1246-1247)』1983年1月1日,15頁。

⑧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⑨Yenan Report 26: "The Mind of a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⑩Yenan Report 2: "Development of 8th Route Army's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the".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⑪张其敏:《日本反战同盟在反战侵华中的作用》,《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4页。关于日军士兵俘虏的总数,有三个数字可以参考:根据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时提到,从1937年到1944年5月间,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和投降的日本士兵有3000余人,(见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延安解放社1944年印,12页。美国记者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记载到:到1945年初,日本士兵俘虏的总数为3880人,见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希望书店1946年版,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认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即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俘虏的日本士兵为6959人,其中主动投降的有746人。该数字在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中也有出现,可以看作是中共的官方统计,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66页。虽然与叶剑英和斯坦因的数字相比,出现了不合,这可能是因为战争结束后,增加了以部队为单位的投降者。

⑫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208, Entry 370, Box 377.

⑬Yenan Report 59: "Statistics on Japanese POWs taken by the 8th Route Army", NARA, RG208 Entry 370, Box 377, 1945/3/27.

⑭埃默森著、宫地健次郎译『嵐の中の外交官—ジョン・

エマーソン回想録』、図書印刷株式会社、1979年、157頁。

⑮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⑯Yenan Report 22: "Poll of Japanese Prisoners on General Attitudes", by John Emmerson.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⑰Yenan Report 26: "The Mind of a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⑱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165, Entry 79, Box 2603, 1944/11/10.

⑲野坂在日人解放联盟纲领草案中,共提出了八条:1.结束敌对状态;2.实现持久的和平;3.将使我国强盛繁荣的经济政策;4推翻军国主义的独裁统治;5.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6.改善人民生活7.保障士兵和水兵家属的生计;8.组织人民的政府;见野坂参三『野坂参三選集 戦時編』、新日本出版社、1967年、365~370頁。

⑳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㉑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London: Robert Hale Limited, 1946), pp. 106.

㉒Yenan Report 59: "Statistics on Japanese POWs taken by the 8th Route Army", collected by 8RA and JPEL, transmitted by Adie Suehsdorf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㉓[美]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陶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牺牲的日本反战士兵至少在30人以上。

㉔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 165, Entry 79, Box 2603, 1944/11/10.

㉕Yenan Report 26: "The Mind of a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1944/11/21.

㉖Yenan Report 26: "The Mind of a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㉗他们虽从事反战活动,但心理极为复杂,对这点必须留意。这些战俘大多使用假名字,不仅考虑到他们的活动和家族安全的目的,也存在背离祖国的意识。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㉘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 165, Entry 79, Box 2603, 1944/11/10.

㉙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⑤⑦甘泗淇:《一二〇师抗战三年来的政治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第9期,1940年9月24日,第28页。

⑤⑧[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蔡静译,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⑤⑨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⑥⑩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 165, Entry 79, Box 2603, 1944/11/10.

⑥⑪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 165, Entry 79, Box 2603, 1944/11/10.

⑥⑫A班学员多数为刚被俘的日本士兵,主要学习社会主义基础理论。该门课程为初步的政治教育,课程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内容为社会怎样发展的。这门功课的目的在于从理论上使学生了解战争及军部的罪恶。学习期限大概为一个月;B班为程度较高的班级,为被俘虏一年以上的士兵,主要学习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该门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内容为:(1)日本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社会制度(2)日本资本主义及其独特的经济和政府结构(3)人民民主和我们的目的(4)当前的战争及日本的前途等,该课程大约需要100个课时,每次课3个小时,全部课程大约需要15周。C班为该校的资深成员,主要学习苏联共产党史,教员是野坂参三。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⑥⑬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⑥⑭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⑥⑮Yenan Report 26: "The Mind of a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⑥⑯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⑥⑰齐文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版,第50~52页。

⑥⑱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⑥⑲工农二部始于1944年4月20日。随着学员数量的增加,设立二部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加。未经长期初步再教育或没在 frontline 经过彻底审查的学员开始到来,日本人也开始派遣

特务,对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进行破坏。1944年1月,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华中支部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建立工农学校二部。学员被送往工农学校二部,主要是为了调查。一旦他们的历史被查明,就会被送到工农学校进行政治教育。对待特务也是如此。一旦他们彻底坦白,所交代的内容让干部们和野坂校长满意,就被移交给工农学校。极其恶劣的顽固分子被送到二部,骨干们将他们隔离起来,防止他们对新学员产生不好的影响。他们将接受短期的再教育课程,当他们变得合作时,再被送回工农学校。参见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⑥⑳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 165, Entry 79, Box 2603, 1944/11/10.

⑥㉑野坂参三表示,目前三分之二的学员(截至1945年1月共有135人)到今年年底即可与盟国占领军合作从事宣传工作。

⑥㉒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 165, Entry 79, Box 2603, 1944/11/10.

⑥㉓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 165, Entry 79, Box 2603, 1944/11/10.

⑥㉔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⑥㉕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⑥㉖1945年11月,约200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从延安出发到达齐齐哈尔,协助八路军做在华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工作,对日本侨民进行启蒙教育,并为八路军物色合作者。据统计,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包括技术人员和护士在内的“日本留用者”有8000人到1万人,其中有三千左右的日本人成为八路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参见[日]古川万太郎:《冰冻大地之歌》,张斌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⑥㉗文化教育研究会编:《敌我在宣传战线上》,文化教育研究会1941年版,第218页。

⑥㉘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国文化社1939年版,第180页。

⑥㉙张香山:《建立敌军工作》,《群众》第1卷第16期,1938年4月2日,第284页。

⑥㉚Yenan Report 48: "The Education of 8th Route Army Troops and Civilians in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written by Adie Suehsdorf and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⑧例如罗瑞卿指出：“对于已经被解除武装之敌军，无论官兵，均绝对不准杀害；除收缴其武装及军用品外，一律不准搜腰包与没收其私人财物和日常用品。且一经解除武装之敌军士兵，均应立即以热烈欢迎的态度对之，不准稍加侮辱和虐待；且立即向之进行初步的解释，说明我军决不杀害他们而且优待他们，以打破其恐怖之心理，使之安心。”并告诫说：“对于十分顽固倔强的分子，亦应耐心对付，不应与之计较，而意气用事。”参见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第10页。

⑨文化教育研究会编：《敌我在宣传战线》（上），文化教育研究会1941年版，第213页。

⑩山本武利『延安リポート—アメリカ戦時情報局の対日軍事工作』、岩波書店、2006年、507頁。

⑪水谷尚子『「反日」以前：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文藝春秋、2006年、83～84頁。

⑫防衛庁戦史部『金原節三業務日誌』、昭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

⑬秦郁彦『日本人捕虜：白村江からシベリア抑留まで』、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4年、151頁。

⑭防衛庁戦史部『金原節三業務日誌』、昭和十八年一月六日。

⑮姉川校正『生きていた捕虜』、『文藝春秋』、1957年3月。

⑯陈明钦等：《中外人士访延纪实 封锁线内的真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⑰防衛省戦史部、昭和14年12月19日「共產軍第三縦隊第三軍区並其ノ対俘虜工作ノ状況」、『陸支密大日記』（出版地、出版社）、210～215頁。

⑱井上久士『中国共産党の捕虜政策と日本人反戦運動』、『近きに在りて』、1998年11、5頁。

⑲蔡前：《八路军抗战以来敌军工作经验》，《八路军军政杂志》第5期，1939年5月15日，64页。

⑳山極晃『米戦時情報局(OWI)の延安報告』二松学舎大学国際政経論集(8)、1-19(2000-03)二松学舎大学、5～6頁。

㉑防衛省戦史部『金原節三業務日誌』、昭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

㉒早乙女勝元『延安からの手紙：日本軍の反戦兵士たち』、草の根出版社、1991年、120～121頁。

㉓根据埃默森记录：现在的俘虏自主的投降率为30%，参

见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written by Emmerson,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㉔ガンサースタイン著；野原四郎訳『延安：一九四四年』、みすず書房、1962年、290頁。

㉕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反戦兵士物語：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員の記録』、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1963年、森健の手記。

㉖秦郁彦『日本人捕虜：白村江からシベリア抑留まで』、中央公論新社、2014年、147頁。

㉗[美]根室・史坦因：《延安的日本俘虏》，谷桃译，晨社1946年版，第8页。

㉘赵安博：《蜕变——记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解放日报》1942年6月12日，第2版。

㉙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反戦兵士物語：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員の記録』、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1963年、285頁。

㉚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㉛Yenan Report 45: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 A study", by Ariyoshi,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㉜藤原彰、姫田光义『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東京：青木書店、1999年、177頁。

㉝石堂清伦『大連の日本人引揚の記録』、東京：青木書店、1997年、227頁；石堂「解説」(五味川純平「五味川純平著作集」三一書房、1984年、462頁)。

㉞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延安日本労農学校の記録』、サイマル、1984年、197頁。

㉟藤原彰、姫田光义『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東京：青木書店、1999年、107頁。

㊱Yenan Report 21: "The Policy of the 8th Route Army Towards Japanese Prisoners", NARA, RG 165, Entry 79, Box 2603, 1944/11/10.

㊲关于这一部分内容，详见：曲利杰、邓军：《抗战时期美军对中共心理战的考察与借鉴——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6期。